

论浙东文化对宁波特色文化建设的影响

黄义务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宁波 315012)

摘要: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东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宁波地域特色,是深深烙印在宁波人身上的“文化基因”。浙东文化在明清时期曾对宁波的社会发展起过巨大促进作用,在现代特别是当代对宁波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本文联系了宁波发展的过程来思考浙东学术文化思想成果的影响及其时代价值。

关键词:浙东文化;宁波;特色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7109(2009)03- 0014- 04

一个城市文化建设内容的本质规定性和各种条件的总和构成了该城市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它是文化发展的基点。宁波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在于,它具有历史文化内容的先进性和丰富性以及现代文化的现实创造力。具体特色表现在宁波文化是浙东文化、宁波商帮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的融合,是在三者组合基础上的创新,是一种多元化文化组合的结果。其中博大精深的浙东文化是宁波特色文化的核心,为宁波特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浙东学派概念的梳理

在唐朝,人们往往把浙江以钱塘江为界限,划分出了浙东和浙西两个区域。现在的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区都隶属于浙西区域,而宁波、台州、金华、温州等地方则隶属于浙东。

在南宋把临安定都之后,浙江逐渐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不断的发展中,浙江文化也渐渐的发展成了两大组成部分——浙西文化和浙东文化。而浙东学派是则是浙东文化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现在学术界所谓的浙东学派,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指向。

一、是指南宋时的浙学,其中也包括金华学派的文献之学、永康学派的王霸之学、永嘉学派的经制治法之学、四明学派的卓然自立之学和台州学派的气节践履之学等。

二、指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术学派,主要是以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念鲁、章学诚等为代表的以研究经学为主,也兼史学的经史学派。此时的金华学派侧重朱(熹)学和吕(祖谦)学的结合,永康学派讲究的是文章事功之学,永嘉学派主攻的是典章制度之学,四明学派则是陆(九渊)王(应麟)之学的延伸,台州学派研究的是程朱理学的践履。

本文所指浙东学派是狭义的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台州、宁波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因学人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宁绍地区,地处浙江之东部,故名之。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便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如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清初浙江的学术以钱塘江为界,由浙东和浙西两部分组成。杭嘉湖地区是浙西学者的主要活动地区,如桐乡张履祥、吕留良,钱塘应璩谦,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学者。浙东学术主要以余姚、鄞县、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如黄宗羲、朱之瑜、邵廷采、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著名学者。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以经世为目的。但浙西学术主要表现为表彰朱熹学术,尊朱以经世;而浙东学术则偏重于史学研究,治史以经史。章学诚把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归纳为“浙西尚博雅,浙东贵专”。

浙东学术自汉唐开始初步发展,历经宋元、明清各朝,最终在清顺治年间形成浙东学派。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先后有王充、虞世南、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鸿儒的发展,成为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区域性学术派别。尤其是明代王学的崛起,打破了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局面,影响深远。王阳明远承陆九渊的心本论,近接朱陆合流的趋势,创立了博大精深的王学体系。

深入研究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学术文化,系统梳理这一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绵延于现当代的学术文化脉络,不仅可以为建设宁波特色文化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也可以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增添一份厚实的成果。

二、浙东文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宁波特色文化的影响

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非常的庞杂,著作同样也是繁多,其重要学术取向可以归纳为“经世致用”,以经世致用的治学为出发点,同时也主张要尊重客观规律,他们要求学问必须与百姓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这种较鲜明的思想特色,从古至今绵延于浙江的大地上,甚至对后世宁波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开拓创新精神。清代的时候,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学者们。他们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熟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同时还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黄宗羲自称:“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章学诚则说:“学诚从事于文字校讎,盖将有所发明。”清代浙东学人在褒贬臧否学界、文坛各色人物时,也多以是否富于独创精神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第二,兼容并蓄意识。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巨大的包容性。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力倡导并切实奉行兼容并蓄、广采博取的治学风格,反对墨守一家、好同恶异的狭隘学风,这种治学精神为黄宗羲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并影响其后继者,成为整个学派的优良传统之一。浙东学派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在文学思想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冰炭难容的派别之争,实为导致明末清初文坛不振的一个重要病根,浙东学派对此现象痛心疾首,抨击起来不遗余力。本着艺术宽容精神,他们竭力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主张不同流派、风格共存同荣。

第三,博采、求实、重史。浙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培育了博采、求实、重史等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汉时的王充开始,就大力提倡“实知”、“知实”,同时十分强调学以致用。陈亮则在人们讳言功利的封建时代,理直气壮地高举“功利主义”的旗帜,反对道学的不务实际、空谈性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知行并进”,在强调道德行为自觉性的同时,也注重道德意识的实践性,其实质在于提倡力行。清代浙东学派在批判道学末流的空谈时,更是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

第四,与民间文化精神的有机契合。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海运、商贸、经济发展较早的宁波社会氛围当有一定关系,反过来又对宁波人的经商积极性有正面影响。历史上浙东学术大师一再表现出对“工商”的高度重视,就与浙江各地的民间工商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这种“工”和“商”相结合的民间传统,对于关注民生的浙江古代思想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将浙东传统学术文化置于民间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经济实践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和考察,深刻把握两者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化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一项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课题。

具有鲜明特色的浙东文化传统,是宁波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建设宁波现代学术文化的坚实起点。在这种开放的学术环境下,宁波人天性也凸显外向的特征。宁波人素有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俗谚“无宁不成市”。孙中山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此外,影响绵长的浙东学术为宁波人的伦理思想和互助、慈善行为提供了理性基础,尤其浙东学派的公私观、经济观、富民观、义利观,由于切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多少年来成了工商意识发达的宁波人的文化自觉,从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传承下来,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成为宁波人文精神的特质。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宁波人民能培育出“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克勤克俭、务实进取;团结互助、讲求联合;以德立业、诚信为本”的精神,都是由于文化的创新所带来的。

总之,影响深远的浙东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务实诚信、乐善好施的宁波人,曾经深藏书斋的浙东文化,如今正在宁波描绘一幅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繁荣的新图景。浙东文化使宁波文化具有了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的务实精神、信誉至上的诚信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因而宁波在新时期的崛起也就在情理之中。

三、立足传统文化,建设新型宁波特色文化

宁波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对宁波名城特色做了概括: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唐宋以来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口岸,浙东文化的摇篮,明清以来反对侵略斗争的前沿,这对宁波的城市文化的一个综合性概括。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宁波人民不仅要立足传统文化,更要在些基础上寻找文化新生长点,建设宁波新文化。

(一)继承发扬宁波传统文化精华,发挥文化的存量优势。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宁波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建于北宋的江南第一楼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始建于汉晋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他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及以著名商帮“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海防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等,构成了内容极为丰富又极具个性的宁波地域文化。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既深深扎根于本土,又在生生不息中影响着世界;既具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具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特别是从明清以来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但近代以降,这块土地逐渐变为“经济热土”,经济功利性有所增强,而文化含量有所流失,文化品位有所滑坡。为此,对这些文化遗产一要保护,二要研究,三要利用,四要建设。要号召人人都来爱护、积累文化。

在挖掘宁波文化的“潜在优势”方面,一是要扩大宁波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文化建设上要有开放性眼光:宁波文化不单指本乡土的文化,更是涵纳其所属的文化大系统—吴越文化系统。从地域上说,宁绍同属浙东文化圈。早在30年代,甬籍上海商界巨虞洽卿的轮船公司打的就是宁绍的旗号,更何况史上绍兴也是王阳明、黄宗羲等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主要地区。文化与经济一样,有着地域上的相近性,互通性。宁波要树立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应在打出藏书文化等旗号的同时,打出“宁绍文化”(大禹文化、兰亭文化、鲁迅文化)的旗号;二是应重视挖掘以往注意不多的“潜在”传统文化,如海外交流文化(包括在日本影响广泛徐福文化与朱舜水文化)、流传于全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梁祝文化、独一无二的上林湖青瓷文、唐诗之路文化、古建筑文化、古石刻文化、

钱币文化、民间工艺文化等等,并加以建设、光大,丰富今天宁波的文化宝库;三是重视对包括镇海口抗敌史迹、四明山根据地文化、港口创业史在内的革命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二)寻找文化新生长点,建设宁波新文化。

选准宁波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以此作为文化新生长点。现今广场文化、足球已成上海文化的载体,那么宁波的文化载体是什么呢?我认为藏书文化可以成为宁波文化载体,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世纪宁波文化的新生长点。历史上这块土地藏书风气很盛,藏书家代有名人,除范钦的天一阁外,南宋以来还有楼钥的“东楼”、范大澈的“卧云山房”、全祖望的“双韭山房”、黄宗羲的续钞堂、鄞县冯贞群(孟撝)的伏附室、镇海张季言的樵斋、孙定观的蜗寄庐以及万卷楼、花崖书院、抱经楼、清防阁等,被世人誉为“藏书之乡”。余秋雨一曲《风雨天一阁》,更使宁波藏书文化名噪天下。我们应借“南国书城”兴建、开放的东风,大力弘扬藏书传统,努力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代化藏书楼;将公共藏书与民间藏书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藏之以读、藏之以用、藏用结合。一方面用以积累文化,另一方面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以期成为未来宁波文化新生长点。

文化是综合国力,是城市的灵魂和标志,又是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城市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竞争,又是文化的竞争,城市文化资源、科技力量、人才队伍更是竞争的重要内容。先进的文化起到凝聚城市现代建设各方面力量的作用,能够最佳组合各种城市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快捷有效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和文化力。珍惜和保护城市文化,发展城市特色,这是每个城市领导和市民的神圣责任。

参考文献:

- [1]陈曙,王传宝.特色文化、文化品牌与宁波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高[F].经济师,2003(12)
- [2]王一川,杨新华,叶百顺.地域文化与宁波经济发展[F].科技创业,2006.3.
- [3]陈依元.经济文化一体化——宁波迈向21世纪的选择[M].宁波:宁波出版社,1999.
- [4]张瞻.论地域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发展论坛,1998(7).
- [5]潘起造.浙东学术的地域文化渊源及其文化精神[J].浙江社会科学,2006(4).
- [6]丁耀明.论宁波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因[J].宁波党校学报,2002(6).
- [7]曹屯裕主编.浙东文化概论[M].宁波出版社,1997.
- [8]祁茗田,陈立旭.文化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9]李斌.宁波人文化品性探源[J].历史教学问题,2003(3).
- [10]《黄宗羲全集》第10册:509.